

《带灯》：“说”出的乡村现代化之痛

张连义

(江苏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以《带灯》为样本,分析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各类人物的性格及命运。分析认为,《带灯》以樱镇综治办主任带灯的行动展示出乡村现代化的原始风貌,集中阐释了贾平凹关于小说即“说话”的理解,呈现出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各种矛盾;现代文明的入侵刺激了农民的私欲,暴露出转型期农村的各种问题,袒露出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伤痛。

关键词:贾平凹;《带灯》;乡村现代化;乡村秩序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4-0136-05

贾平凹认为,小说就是“说话”,其生命力在于言说的内容贴近现实与作家的浪漫化想象。《带灯》集中体现了贾平凹对小说概念的理解,贴近现实的创作理念使其通过对乡镇干部和农民日常生活关注呈现出现代化大潮对乡村的剧烈冲击,袒露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血泪与伤痛;浪漫化想象使其借助于带灯的短信超脱了现实,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内在的张力,更为突出地呈现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伤痛,显示出作家的人文情怀和现代化忧思。

一、“说话”的技巧

贾平凹认为小说是一种“说话”,是一种不需要技巧的言说,而“真”是其魅力所在。“真”存在于生活,存在于个人日常生活的经历,由此对生活的原生态再现也就成为贾平凹关于小说概念的最好诠释。“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说话,不需要任何技巧了,平平常常只是真。……小说让人看出在做,做的就是技巧的,这便坏了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本身的技巧。”^[1]

收稿日期:2014-03-15

基金项目: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1301056C)

作者简介:张连义(1973-),男,山东聊城人,副教授,博士后。

如果说中、短篇小说由于容量有限,限制了作家关于小说概念的诠释,那么长篇小说由于宏大的规模为其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古炉》等长篇小说充分体现了贾平凹关于小说的理解:“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的经验,如果写出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甚至还觉得这样的村子和村子里的人太朴素和简单,太平常了,这样也称之为小说,那他们自己也可以写了,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成功。”“什么叫写活了,逼真了才能活,逼真就得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2]由于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所谓的“真”便是忠实于生活。贾平凹出身于农村,并与农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熟悉农民生活,写起来自然得心应手。在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如《浮躁》、《小月前本》,我们能够看出明显的雕琢痕迹,后来的作品,如《高老庄》、《古炉》,尤其是《秦腔》、《带灯》,则是乡村风貌的本真呈现,集中描绘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真实生活。

如果说小说是“说话”,那么其魅力在于“说话”的技巧,或者说“说话”技巧体现着小说的价值。“小说是什么? 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我们

作过的许许多多的努力——世上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怎样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再走——其实都是在企图着新的说法。”^[1]贾平凹的小说讲究无技巧之技巧,而无技巧之技巧的技巧就是新的“说话”方法。在写作技巧上,作家有意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先是有意识地学习明清文学语言,如《废都》、《高老庄》中语言就有着鲜明的明清白话风格,在文坛普遍借鉴西方话语,追求“文学化”语言的大背景下,“仿古”、流畅的白话显示出独特的存在,其作品也借此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带灯》则把触角伸向两汉,其“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的语言风格引起作家极大的兴趣。“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和风格,它没有那么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何况我是陕西南部人,生我养我的地方属秦头楚尾,我的品种里有柔的成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长期以来爱好着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轻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这令我真的警觉。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3]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却更多地将其用于内容的表达而不是语言的模仿。在《带灯》中,大量应用文内容的“实录”以及工作总结等内容的植入,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应用文体特征。从这点上说,作家深得两汉文章的精髓。正是这种实用性,使《带灯》更贴近现实生活,也更能呈现出小说“真实性”的特征。两汉文章体现为“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而作家采用这种风格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却是一种情感宣泄,是以拙朴、直白的文笔表达厚重、尖锐、具有震撼性的内容。

但小说毕竟是一种审美,出身于陕南山区的作家具有浓郁的浪漫情怀,再加上“说话”本身固有的浪漫化想象,作品具有了一种浪漫的意蕴,也就有了带灯诸多具有浪漫化色彩的短信。毋庸讳言,带灯的短信在作品中更具文学性,也更具审美性。如果说作品的主体代表着一种现实,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那么这些短信寓示着一种理想,是试图以想象的浪漫生活摆脱琐屑生活的缠绕。无疑,带灯的短信代表着另一种人生想象,或者说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如果说现实人生是人的形而下的磨难,那么浪漫化

想象则是形而上的追求,也正是这种形而上的浪漫化想象为人生提供了生活的源泉和动力。带灯正是借助于发给元天亮的信息,在想象中寻求到一种精神安慰,以暂时摆脱婚姻的不幸和俗世生活的纠缠。其实,元天亮更多时候只不过是带灯臆想的一个对象,与其说她是出于对元天亮的崇拜,倒不如说是为了摆脱生活的烦扰而臆造出的对象,是一个满足浪漫化想象的意象。

现实与理想的冲突通过现实生活与浪漫化想象,化成了纪实性的文笔与带灯写给元天亮的浪漫化短信,从而形成作品文本的内在分裂,而其表现出来的恰恰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二、乡村生活的真实呈现

贾平凹关于小说概念的理解使其作品最大限度地呈现出生活的原貌,《带灯》更以两汉的“史”的笔法展示出樱镇农民的生存情景和乡镇干部的生存状态。由于追求原初的生活状态,《带灯》也就成为最大限度地隐藏作家个人倾向的乡村记录。当作家以镇政府综治办干部带灯为线索展示乡村矛盾的时候,乡村城市化的选材同时展示出乡村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的原始风貌以及处于其间农民本真状态。

主人公带灯是地处偏远山区的樱镇综治办主任,综治办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与其打交道的更多地是“有问题”的农民。带灯的工作性质使其几乎涵括了农村农民的所有矛盾,集中反映出农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农村存在的诸多问题,并由此展示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真实景象。由于地理闭塞、思想落后,樱镇到处弥漫着贫困与愚昧,甚至空气中也散发着污浊的气息。在樱镇,人人身上都有虱子,甚至乡镇干部也不例外,当带灯建议开展消灭虱子的运动时,镇政府领导虽然表面上同意,但不给予实际支持,该运动以失败告终。镇政府干部如此,其辖下的乡村更甚。带灯和竹子到甜井寨处理事务,遇到一户人家的男人过生日,女主人给丈夫煮4个鸡蛋就算过了生日,而孩子连鸡蛋也不能吃,女主人甚至委婉地向带灯和竹子表达了不会让她们吃鸡蛋的意思。当地居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贫困与愚昧已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矛盾频频爆发,集中呈现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原始风貌。带灯的主要工作是处理乡村矛盾,其中既有民间矛盾又有官民纠葛,而二者又往往纠缠在一起,从而使矛盾更

张连义:《带灯》:“说”出的乡村现代化之痛

为复杂。马连翘的公婆年龄大了,分别跟着两个儿子,但由于两个儿子不和,互相猜忌,结果公公婆婆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两个人不仅不能在一起生活,而且见面也受到了限制,两个老人无奈地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公公喜欢吃鲜核桃,婆婆就在马连翘家偷拿了几个鲜核桃趁“约会”的时候给公公,马连翘发现之后不仅收回了核桃还对其辱骂。如果说马连翘限制公婆在一起生活是属于认知问题,那么因为几个鲜核桃辱骂婆婆则纯粹属于道德问题。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儿媳妇一般是没有地位的,诸多作品中的“恶婆婆”形象反映出儿媳妇在家庭中的卑微地位,但在《带灯》中,儿媳妇与婆婆的地位完全颠倒,传统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颠覆性冲击。张膏药的儿子死后,张膏药和儿媳妇因为赔偿金翻脸,在以后的诸多事项中也因为钱财问题公开你争我夺。家庭关系如此,邻里关系依然。镇东街贾有富和王成祖之间因为宅基地纠纷,直接闹到法院,而矛盾的最终解决也是镇政府出面协调,另外拿出一块宅基地了事。人们的私欲毫无顾忌、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传统价值观念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乡村秩序遭遇颠覆性冲击,呈现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乱象”。

在乡村秩序遭遇颠覆性冲击的同时,作为权力系统末梢的个别乡村干部和基层行政组织的个别乡镇工作人员人格也发生了扭曲。如果说乡村秩序因为本身所具有的封建象征意味,其解体具有一定的悲剧必然性,那么乡村和乡镇干部的人格扭曲则具有了更多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其道德品质。东岔沟村的村支书“把村里架电线收的钱自己花掉,把计生罚款花掉,带灯曾让他代领过村里三户特困户的救济面粉,他也放在自己家里吃了。他把村公章揣在自己怀里,谁要盖章先和他去地里帮着干活,再交十元八元钱。”朱召财去上访,村民打了朱召财老婆两个耳光。……村干部身上表现出十足的官气和匪气。村干部如此,乡镇干部亦然。马副镇长带领镇计生办人员去村里抓计划生育,孕妇一家得知消息提前藏了起来,马副镇长进入猪圈打得猪嗷嗷叫,并虚张声势要将猪牵走,孕妇的公公心疼猪跑了出来,孕妇因此暴露了目标。马副镇长、吴干事、翟干事乃至村干部表现出人性的残忍和意识深处的权力意识,但作家并没有将罪恶归咎于他们个人,而是更多地探寻其背后的客观因素。就如《带灯》后记所说:“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

尊重了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条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责挨训被罚,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地飞来,他们只有两双手呀,两双手仅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他们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这种工作职能决定了它与社会摩擦的危险性。作家对基层干部表现出理解和同情,将其性格扭曲的原因归结于环境的压抑和个别现行体制的弊端,显示出对问题的独到认识,也表现出内心的人文情怀。正如著名评论家李星所说:“这部作品反映当代农村社会问题,作者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标志着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又迈上新的高度。”^[4]

在讲述基层干部人格扭曲的同时,作家也从带灯身上看到了希望。带灯虽然身处镇政府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但仍保存着内心的“洁白”,努力以个人的微薄力量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如主动帮助得了矽肺病的农民工维权,组织、带领妇女去外地摘苹果,主动帮助农民解决抗旱等实际困难等。其实,在日常的工作中,带灯接触到的更多是农民表现出来的丑陋一面,但她始终以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农民,正如她在给元天亮的短信中所说:“我有时说话直了对方是泼皮无赖让我无法忍受,但我总看到他家人或亲人有闪光人性之处让我心有退让。”^[3]“农村么,当有矛盾冲突时,是少有人出来公正的,也少有人明白地说谁是谁非,但你相信,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就像风吹着田地一样,人气却还是一股梢地向着正经的一边的。”^[3]带灯代表的是一种温和的处理纠纷的方式,对农民表现出理解与宽容,也是作家塑造的理想干部形象。虽然在解决纠纷的时候,带灯也偶有暴戾的意气之举,但基本上代表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也使人从中看到了希望。

三、乡村现代化之痛

现代化原本是一个美好的想象,但当现代化过程原生态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对乡村秩序的冲击以及给农民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伤痛也是触目惊心的。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就如作品所说,问题就像陈年的蜘蛛网,抖哪里都落灰尘。在乡村,传统与现代互相纠缠,共同发挥着作用。在现代

文明进入乡村的时候,传统以种种形式表现出生命的活力。“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在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时,传统甚至不会抗拒变迁,这种环境几乎没有将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的标志,通过这些标志,变迁具有了任何一种富有意义的形式。”^[5]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方式已经失去了约束力,而以法制为基础的现代规范又不健全,现代规范与传统习惯同时存在却又同时缺位,几乎所有人都在传统与现代中寻求依据从而谋求自身利益。很多人将罪恶归于现代文明,似乎现代文明本身与道德下降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否认,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个人欲望迅速膨胀,但将原因完全归于现代文明有失偏颇。乡村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传统乡村秩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部分,并为农民创造更为富裕、幸福的生活。但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农民并未完全认同现代文明要求的现代乡村秩序,而是表现出更多的传统思维惯性,尤其是面对复杂的乡村形势,以法制为基础的现代规范不仅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也往往与旧有的乡村秩序相抵牾。这也决定了乡村现代规范的建构需要一个过程。现代文明是以承认个性为基础,这也为个人私欲的膨胀找到了借口,现代文明也因此具有了堕落的象征。事实上,传统文化本身就有肯定欲望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排斥个人私欲的,就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这个极为典型的求利的国家里,我们正好可以看到,‘营利欲’、对财富的高度推崇甚至独尊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等等,本身与现代资本主义丝毫没有关系。”^[6]当传统思想的营利性欲求与建立在生存基础上的乡村世俗哲学相融合的时候,便有了基于生存的乡村实用哲学,只不过在大多数时间,其被田园风光的宁静祥和所遮蔽,或者是说在大多数时间里,乡村传统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和谐的一面。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当乡村与外界产生交集,特别是现代文明借助于正当合法的形式进入农村的时候,其丑陋的一面也就暴露无遗,尤其是现代社会对个人私欲的肯定更刺激了他们的欲望,也为欲望的实现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另一方面,当现代文明对其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时候,他们又会以旧有的乡村秩序为借口,轻易地对现代规范做出否定。个别村干部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绝不是现代文明的表现,乡村选举中村干部与乡镇干部的同流合污更是与现代文明相悖;村干部在遭到大多数村民的抵制之后,已

经在村上失去了公信力,他们之所以能够继续在任,正是“权力”暗中操作的结果。为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他们不断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传统秩序和现代规则都蜕变为他们谋求利益的手段。在金钱的诱惑和欲望的鼓噪下,各种矛盾频发,原本宁静的乡村失去了和谐的气氛,每个人都在为利益疯狂的追逐甚至不惜大打出手。元家与薛家因为挖沙产生矛盾,甚至为此大打出手,最终闹出多条人命,正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矛盾的缩影。

对于偏远、贫困的农村来说,他们的现代化之路一方面是外部工业的侵入,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本地自发的工业化。但无论哪一种方式,都需要农民参与其中。大矿区需要大量的工人,樱镇不少农民去那里打工,他们中的不少人得了矽肺病。由于不能享受免费医疗,工厂又拒绝给予补偿,他们只能在家里忍受病痛的折磨。即使大矿区赔偿他们,他们的钱也不会全部用于看病,因为家里一大堆花钱的事情等着他们。由于大矿区污染严重,给当地农民带来所谓繁荣的同时,也给他们将来的多舛命运埋下了伏笔。这就是乡村现代化正在走的道路,并在种种原因刺激之下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就在大矿区的负面影响日益显露的时候,樱镇引进了污染更为严重的大工厂。应该说,大工厂是镇政府追求政绩的产物,在镇政府追求政绩的同时,也有人利用大工厂建设的时机谋取个人利益,而他们又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做出牺牲的则是樱镇的普通农民。元家与薛家兄弟霸占河道挖沙盈利,原本作为公共资源人人可免费使用的沙子成为他们盈利的工具,也就是说,他们是将属于河道两岸所有村民的财产霸为己有、为己谋利。詹明信在分析具有寓言意味的第三世界国家作品时说:“这样,资本主义的原始罪恶被揭露了:不是工资劳动、货币形式的劫掠和市场的冷酷无情的循环,而是旧的集体生活方式在已被掠夺和私人占有土地上所受到的根本取代。”^[7]从《带灯》不难想象乡村现代化带给农民的伤痛。

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不同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由于具体情况不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以农业为基础且有着深厚的封建性传统,自然探索出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现代化并非等同于‘工业化’或‘西方化’,工业化

张连义:《带灯》:“说”出的乡村现代化之痛

仅仅是现代化社会里诸多过程中的一一个。尽管工业化被赋予了广泛的含义,但其在含义上与农业进程有所区别。”^[8]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性概念的多元性与差异性,那么以封建社会为基础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无疑具有封建性与资本性混合的特征。由此也不难理解中国的乡村现代化之路为什么会与传统互相胶着。传统的存在,尤其是传统的营利性欲求与现代社会的欲望追求融合在一起,不仅是个人私欲的过度膨胀,也限制了现代文明。“总结以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一个深刻的教训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并没有充分反映现代化进程的实质。现代化就是实现启蒙提出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理想。现代化的原则是强调社会的发育和个人自由的发展。然而,第三世界国家半个多世纪的现实进程,由于受到各种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干扰,距离这个境界还相去甚远。”^[9]由此,以乡村工业化为特征的乡村现代化之路在注重物质财富的同时,显然缺少对“人”的关注,也就是说,其物质财富的积累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社会的健全发育也被严重地忽视。由此也不难理解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四、结语

尽管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

对乡村污浊、贫困、愚昧的清醒认知以及现代化所代表的历史发展趋势,还是迫使作家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带灯》呈现出的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与丑陋现象,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必然伤痛,也是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参考文献:

- [1] 贾平凹. 我心目中的小说:贾平凹自述[J]. 小说评论, 2003(6):20-22.
- [2] 贾平凹. 古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3] 贾平凹. 带灯[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4] 路艳霞. 贾平凹 60 岁写《带灯》反映农村社会问题 [EB/OL]. (2012-11-21) [2013-10-11].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2-11/21/c_123978452.htm.
- [5]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0.
- [6]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 洪天富,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7]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陈清侨,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 [8]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陶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9] 尹保云. 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DAI Deng : “speaks” out sufferings in modernization of countryside

ZHANG Lian-y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Changzhou 213001 , Jiangsu , China)

Abstract: By taking the masterpiece DAI Deng as a sampl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varied social issue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s and destini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what DAI Deng has done, who is the director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fice in Ying town, presents the original townscape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various contradictions in its process. It also expounds the feature of “speaking” of JIA Ping-wa’s novel intensively. The invas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lso provokes the selfish desires of peasants. All kinds of problems are revealed in the period of countryside’s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ufferings are also expos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JIA Ping-wa; DAI Deng;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countryside order